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动员的微观考察

——以河南省光山县吕围孜大队为例

张金林

[摘要]在1962年底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大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吕围孜大队是中共光山县委确定的22个试点大队之一,于1963年12月18日至1964年5月25日开展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吕围孜大队的大部分干部和群众惶恐不安,顾虑重重。为了消除干部和群众的顾虑,社教工作队运用了多种社会动员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动员中,坚持了政治正确原则,使国家意志迅速渗透到基层。同时,由于地方性等因素的制约,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组织在社会动员的实际运作中,并未出现有些学者所说的困境。

[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动员;吕围孜大队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1-0019-21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后,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①。运动从1962年底开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了了之,持续了近4年时间。在此期间,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重点开展了社教运动,其他地区普遍开展了面上的社教运动②。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的开展,各地大都广泛地进行了社会动员。目前,学术界关于社教运动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甚少,且多为宏观性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的考察③。本文以河南省光山县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为例,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社教运动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效果。

一、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的过程

社教运动发动起来后,各地相继进行了试点。但是,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各地的试点情况不尽相同,较为混乱。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中共中央研究制定了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用以指导运动的开展。1963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彭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认可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④,此为社教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5月20日,“前十条”连同7个附件被作为中央正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9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

③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玉强《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刘凌旗《非常规权力组织与角色交叉:四清运动动员主体的权力困境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28页。

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①。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由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和刘少奇修改认可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②,此为社教运动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同日,“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一起被下发到全国各地^③。

“双十条”制定后,以此为指针,中共信阳地委对全专区农村的社教运动进行了部署。1963年10月22日至28日,地委召开了全专区各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决定“淮南七县和确山、信阳市郊,今冬明春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冬季生产为中心”^④。11月22日至25日,地委又召开了淮南7县1市和确山县第一书记会议,要求各县“组织三百至四百人的工作队”,在一些大队重点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⑤。

11月2日至24日,中共光山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决定分两批开展社教运动,并要求“坚决搞好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队,达到高标准”^⑥。会后,在37个大队开展了第一批社教运动。其中22个大队被确定为试点大队,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是试点大队之一。县委向吕围孜大队派驻了由22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包括县级干部1人、公社党委委员6人和一般干部15人^⑦。

表一 中共光山县委驻吕围孜大队社教工作队主要干部分工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所驻生产队	工作队职务
栗忠良	商业局	局长	吕围孜大队	队长
杨光文	县委组织部	秘书	黄大店	副队长
邵保和	城郊公社党委	组织干事	黄大店、西王湾	片长兼搞整党
管绪光	商业局副食品加工厂	厂长	涂小湾、白果树、陈小湾、九圪	片长
张秀荣	商业局食品公司	副经理	林场	片长
代佐坤	县广播站	编辑	办公室	工作汇报
叶继顺	粮食局	办公室主任	翁东、翁西、夏店、湾湖、吕围孜	片长

资料来源: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印《光山县二十二个社教试点大队资料汇集》(1964年6月1日),光档1-1-531;《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说明:以“10”开头的档案是光山县档案馆“光山县四清工作分团”全宗。由于该全宗档案编号较混乱,为了利用方便,笔者按原档案顺序重新进行了编号。以下所引用该全宗档案的编号,均为笔者重新所编。

关于第一批社教运动的步骤,县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出了指导性意见,规定大体分五步:“第一步,从生产入手,宣传中央‘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并具体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掀起生产高潮。第二步,扎正根子,串联发动,回忆诉苦,成立贫、下中农组织,整顿阶级队伍。

①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2~111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32~1333页。

④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部署情况的报告》(1963年11月2日),光山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2-569(以下简称:光档1-2-569)。

⑤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我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情况报告》(1963年11月30日),光档1-2-583。

⑥ 《孙化三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稿)》(1963年11月24日),光档1-1-486。

⑦ 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印《光山县二十二个社教试点大队资料汇集》(1964年6月1日),光档1-1-531。

第三步,动员干部放‘包袱’,彻底进行‘四清’。第四步,开展对敌斗争。第五步,搞好组织建设,组织生产新高潮。”^①

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从1963年12月18日开始,至1964年5月25日结束,用时160天^②。但是,并未严格按县委建议的步骤开展。工作队结合实际,根据新政策,对运动的步骤作了调整。首先,调整受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后,各公社(镇)根据县委部署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影响^③。1963年12月上、中旬,白雀公社和城关镇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12月20日前后,其他公社也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用时11至12天,学习“双十条”,部署本公社面上的社教运动^④。其中,城郊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于12月22日召开^⑤。根据公社(镇)三级干部会议的部署,运动分4步:第一步,宣传“双十条”,初步揭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解决贫、下中农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整顿阶级队伍,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初步刹住歪风,全面检查与组织生产;第二步,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检查分配政策,搞好年终决算;第三步,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检查与纠正违反“六十条”的行为,将各项政策纳入“六十条”的轨道;第四步,从总结生产入手,评比表扬模范,掀起生产高潮^⑥。其次,调整受1964年3月22日县委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的通知》的影响。通知要求试点大队在运动后期,建立健全以大队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包括党支部委员会、共青团支部委员会、妇代会组织、民兵武装组织、大队管委会、监察组织、治安保卫组织、民事调解委员会、政治指导员和贫、下中农组织等^⑦。

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共分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3年12月18日至1964年1月26日^⑧)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双十条”,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此阶段分4步:第一步,宣传“双十条”,出“安民布告”,解除思想顾虑,部署生产,初步掀起生产高潮;第二步,训练骨干,揭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依靠贫、下中农等3个“盖子”,解决贫、下中农的困难;第三步,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第四步,开展对敌斗争,对“四类分子”进行评查,查“四类分子”的影响,对群众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⑨。

第二阶段(1月27日至3月5日^⑩)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揭“盖子”,动员干部放“包袱”,组织查账人员查账,解决干群关系问题。这一阶段分5步:第一步,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双十条”中关于团结95%以上干部与“四清”方面的规定及县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财务管理的规定》;第二步,发动群众“背靠背”地揭干部“四不清”的“盖子”;第三步,训练技术力量,组织清账组查账,彻底揭开干部“四不清”的“盖子”;第四步,发动群众学政策,确定“四不清”的性质,划清界限,进行民主处理,组织干部退赔兑现;第五步,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⑪。

①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光山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第三阶段情况的报告》(1963年11月25日),光档1-1-484。

②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③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光山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第三阶段情况的报告》(1963年11月25日),光档1-1-484。

④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63年12月31日),光档1-1-487。

⑤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1963年12月24日),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光档1-2-592。

⑥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63年12月31日),光档1-1-487。

⑦ 中共光山县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的通知》(1964年3月22日),光档1-1-548。

⑧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⑨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⑩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⑪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光档10-1-92。

第三阶段(3月6日至4月16日^①)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贯彻“六十条”,解决公私关系问题。此阶段分5步:第一步,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六十条”,认识“六十条”的意义,统一思想,提高觉悟;第二步,回忆对比,总结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诉小农经济和单干的苦,对群众进行爱国、爱社、爱集体教育;第三步,评功摆好,揭公私关系方面的“盖子”;第四步,以“六十条”为准则,进行民主划界,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第五步,制定生产规划,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掀起生产高潮^②。

第四阶段(4月17日至5月25日^③)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巩固运动成果。5月10日,县委书记孙化三在社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生产大忙季节到了,根据地委指示,县委考虑运动至此要暂时停下来。”他要求“从这次会议开始,全党力量,全体干部力量,要全力抓好生产”,社教运动“走到哪一步停到哪一步”^④。此后,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进入扫尾阶段。此阶段分5步:第一步,调整干部班子,充实骨干力量,加强基层组织的领导;第二步,学习文件,读毛主席的书,进行思想建设;第三步,解决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第四步,建立各种档案;第五步,总结运动,巩固运动成果^⑤。

二、吕围孜大队各阶层对社教运动的反应

在社教运动前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倾向斗争中,光山县大都搞得比较彻底,步伐过急过快,积累了一些矛盾,给干部和群众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其对政治运动充满了顾虑与担忧。“镇反”运动中,全县逮捕了2568人。其中826人被镇压,925人被管制^⑥。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全县有585人被划为右派^⑦。反“潘、杨、王”运动中,全县贴出大字报17485098张,提意见51913499条,2129名干部受到教育,98325人(农业社员、工人)作了检查,99329户交出粮食307456斤,56323亩自留地被退还给农业社^⑧。庐山会议后,光山县在1959年冬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抓小“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一批对“左”倾冒进做法有异议的党员和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打击,如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被打致死^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光山县的步子迈得更大。“大跃进”中,1958年3月4日,县委提出了粮食亩产超过1000斤的口号。18日,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1958年粮食亩产1200斤,争取1500斤,1962年达到3000斤,争取3500斤;1958年棉花亩产80斤,争取100斤,1962年达到250斤,争取300斤^⑩。为了完成任务,全县不少地方虚报了粮食单产数,放高产“卫星”。白雀五四公社放出了水稻亩产12万斤的超级“卫星”^⑪。浮夸粮食产量带来了高征购。当时宣称1958年全县粮

①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②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③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④ 《妥善暂停社教 全力抓好生产——孙化三同志在社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记录稿)》(1964年5月10日),光档1-1-527。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⑥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⑦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上),未刊稿,1959年,第192页,光山县档案馆藏。

⑧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上),第196~197页。反“潘、杨、王”运动是指在发动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河南省党内外开展的一场揭发与批判以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参见胡佛云、侯志英主编《当代河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6页。

⑨ 光山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光山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⑩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51页。

⑪ 靳占修《不堪回首“天堂”泪——原河南省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刑的前前后后》,《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食总产量是51164.59万斤^①,而实际总产量仅为34724万斤^②。1958年全县征购粮食10317万斤^③,1959年征购粮食11894万斤^④。在工业方面,开展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8月1日至9月15日,全县组织了约4万人,分3批上山大办钢铁。9月中旬至10月底,大办钢铁达到了高潮,全县共动员干部和群众19万余人上山炼钢铁^⑤。10月7日,县委放出了日产钢铁3501吨的“卫星”^⑥。10月29日,又放出了日产钢铁3500.93吨的“卫星”^⑦。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1958年七八月,全县仅用15天时间,就将38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2个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⑧。至11月22个人民公社又被合并成1个县联社——光山新弦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中,猛刮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至1958年底,全县共办了5139个公共食堂,98.5%的人到食堂吃饭^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五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高指标风、“共产风”)泛滥成灾,1959至1961年,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河南省信阳专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事件,史称“信阳事件”^⑩。其中,光山县是信阳专区大饥荒最严重的县,死亡了近20万人^⑪,被称为“光山事件”^⑫。此后,“信阳事件”被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导致的敌人反革命复辟事件^⑬。因此,信阳专区于1960年秋至1961年上半年,进行了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对在“信阳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集训^⑭。其中,光山县共集训了4944人^⑮。

吕围孜大队位于光山县城的西部边缘,属于城乡结合部,群众素有“弃农经商的习惯”^⑯。该大队是二类大队,包括城郊公社林场在内共辖21个生产队(场),总人口是539户2294人,耕地总面积是2426亩,人均耕地仅有1.057亩^⑰。地少人多,缺粮严重。据县委驻吕围孜大队社教工作队和吕围孜大队党支部给城郊公社党委并县委的报告称:截止1963年12月28日,全大队有9个生产队严重缺粮。据对11个生产队的统计,按最低标准,贫、下中农有310户1331人缺大米69700斤^⑱。因此,全大队搞单干副业的人较多。以郭店生产队为例,在全队19户97人中,除1户是孤老和1户有病入外,其余17户均有副业门路。其中,7人拉架子车,7人卖菜,5人打鱼,3人织布,另有用鸭毛换火柴等^⑲。

①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上),第41页。

②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57页。

③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57页。

④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67页。

⑤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中),未刊稿,1959年,第297~298页,光山县档案馆藏。

⑥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56页。

⑦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中),第299页。

⑧ 光山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光山县新志》(上),第261页。

⑨ 光山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光山县志》,第39~40页。

⑩ 胡拂云、候志英主编《当代河南简史》,第137页。

⑪ 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⑫ 光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光山县农牧局农牧志编辑室《光山农牧志(1901-1985)》,光山县城关人民印刷厂印刷,1986年,第14页。

⑬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6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页;乔培华《信阳事件》,第189页。

⑭ 胡拂云、候志英主编《当代河南简史》,第138页。

⑮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大事记(1919·5-1993·7)》,第175页。

⑯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三步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6日),光档10-1-91。

⑰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⑱ 县委驻地工作组、吕围孜大队党支部《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关于缺粮情况的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2。

⑲ 《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郭店生产队当前副业生产活动情况调查》(时间不详),光档10-1-92。

在县委于1962年底至1963年初开展的以刹“单干风”^①、“三清”(清工分、清现金、清物资)^②和“重新教育干部,反击资本主义猖狂进攻”^③为主要内容的初步社教运动中,吕围孜大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④。但由于“前次社教运动搞的(得)不深不透”^⑤,尤其是“有些问题搞出来了没处理”,致使“运动过后封建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又有新的抬头”^⑥。因此,这次社教运动“基本上又是从头作起”^⑦。

基于上述原因,在吕围孜大队此次社教运动中,各阶层普遍对运动心中无底,情绪焦虑,惶恐不安,顾虑重重。

工作队刚入村时,由于对运动的方针、政策、目标、步骤等不甚了解,各阶层对运动的态度不一。总的来说,对运动心存顾虑的人占多数。第一,部分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对工作队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此次社教运动“有奔头”^⑧。但是,也有部分党员对运动的态度比较消极,认为没有必要再搞。有的党员说“去年单干风刹过,三清清过,社教运动也搞过,再搞也没多大油水,无非是六个指头抓痒多一道。”另外,犯有错误的党员“思想紧张,惶恐不安,怕处分,等挨整”,认为“这一关不好过”,希望“就坎下马,借机不干了”^⑨。第二,没有问题的干部和群众虽对运动表示“积极欢迎,拍手拥护”,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⑩。群众普遍有“三怕”,即“怕吃食堂,怕搞‘三定’增加任务,怕不叫搞副业”^⑪。中农“到处打听消息,怕重新划成分”^⑫。第三,有问题的干部和群众有许多顾虑。干部尤其是“有毛病”的干部“怕挨整”^⑬,怕被“一脚踢”,有“长工短工,十月一日满工的‘换班’思想”^⑭。搞单干副业的干部和群众“怕戴资本主义帽子”^⑮，“怕算账,怕交款”^⑯。特别是“搞单干副业不交钱的主动交钱,向干部表态说,只要不戴帽子,叫咋干咋干”^⑰。投机倒把分子“怕斗争,怕戴帽子,怕罚款”^⑱。第四,“四类分子”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惶恐不安”。“有过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尤为恐慌不安,怕被“法办”,并采用各种方法,排泄不安情绪。“有的用请客收买赔情道歉的办法收买拉拢干部,企图侥幸过关”;“有的是采取猖狂的办法,威胁打击群众说什么再搞,我也不够法办,今春搞了,咱还不是咱,运动过去再看,企图阻止群众揭发检举”。但是,也有部分“四类分子”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不管怎么整,也整不掉大腿上的虱子”^⑲。此外,地主和富农子女“怕斗争,怕戴帽子”^⑳。

①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整社工作的情况与意见》(1963年1月18日),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印《光山通报》1963年第1期,光档1-2-578。

②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三清”工作情况的报告》(1963年6月5日),光档1-1-488。

③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四清”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稿)》(1963年6月5日),光档1-2-584。

④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⑥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⑦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⑧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⑨ 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总结》(1964年5月22日),光档10-1-91。

⑩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⑪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⑫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⑬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⑭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⑮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⑯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⑰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⑱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⑲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⑳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展具体工作时,不少干部和群众有许多消极思想和顾虑。如在部署冬季生产,掀起冬季生产高潮问题上,很多干部和群众有“冬闲思想”,认为“冬天没啥可搞”^①。训练骨干,组织骨干放“包袱”时,不少骨干有厌烦情绪,认为“检查来检查去,还不是那些事”。另外,有些骨干“怕丢人,怕检查出来没脸见人,有的怕处分,不相信真能从宽处理,有的怕兑现”^②。扎根串联时,“根子”有“四怕”,即“一怕自己力量小,斗不过敌人;二怕运动过后受打击,受排斥;三怕自己说话没人听;四怕不会串联,不知串联谁,搞不好工作”^③。组织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会时,部分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认为,“组织贫、下中农会没啥用”。有的干部说“只要听话,能生产都是好人,管他阶级不阶级,依靠不依靠”。另外,还有干部说“贫农困难多,意见大,组织起来是自找麻烦。”^④部分贫、下中农会成员的态度也很消极。如青水岗生产队的翁行德第一批加入了贫、下中农会,但未参加第一批入会会员会议,原因在于怕得罪生产队队长^⑤。开展对敌斗争时,部分群众与斗争对象来往密切,甚至给其“通风报信”,“结认干亲”^⑥。

清查干部“四不清”问题时,在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没有问题的干部积极要求搞“四清”。有问题的干部态度消极,有抵触情绪,“怕丢人,怕退赔,怕法办受处分,怕领导不信任,怕开除党籍、团籍,怕说出问题不能当干部,怕家庭呕气等”^⑦。如垮湖生产队队长李正旺说“搞四清不是搞干部的吗?我拉用了四十多元钱吧!不叫干算了。”还有干部说“去年搞三清,今年搞四清,年年搞,年年清,清来清去,还是发了工分少收入。”^⑧普通群众虽“迫切要求”查清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但“指名道姓”地“给干部提意见”,不少人还是有顾虑的,“怕以后干部报复,怕不退赔”^⑨。有的群众说“搞四清又是得罪人的时候来了,提了又得罪干部,过后报复,不提肚子又鼓气。”^⑩大队和生产队抽调的清账人员也有颇多顾虑,“一怕清不出来问题受群众埋怨,二怕清出来了问题得罪干部”^⑪。不少干部家属心存怨气。有的干部家属说“来了运动就整干部,干部还有什么干头”^⑫。

在贯彻“六十条”,解决公私关系问题阶段,由于涉及面广,涉及的人数多,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也比较大,大多数人态度消极,顾虑重重。干部认为,“四清关过去了”,已经“万事大吉了”^⑬。有的干部说“社教运动搞了这长时间了,队里问题处理差不多了,再学习‘六十条’没啥用。”^⑭搞单干副业的群众怕罚款,怕被戴资本主义帽子。有的群众说“社教运动第一步是斗敌人,第二步是搞干部,这一步才该临到我们头上了。”

运动中,工作队将态度消极和有思想顾虑的人定义为落后层。据统计,在全大队落后层中,贫、下中农会成员有“537人,占总成员的33.8%”。落后层的范围广泛,“不仅干部中有,而且党内也有;不仅妇女中有,而且团内也有;不仅中农中有,而且贫下中农中也有;不仅老年中有,而且青年也有”。落后层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少说为佳,不参加会议;怕得罪人,自己吃亏;认为运动来了紧,

①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 光档 10-1-91。

②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 光档 10-1-91。

③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 光档 10-1-91。

④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 光档 10-1-91。

⑤ 刘有胜《青水岗小队扎根串联的初步作法》(1964年1月28日) 光档 10-1-92。

⑥ 叶继顺《如何斗争富农分子吕秀芝情况纪要》(1964年1月20日) 光档 10-1-92。

⑦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 光档 10-1-91。

⑧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 光档 10-1-92。

⑨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 光档 10-1-91。

⑩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 光档 10-1-92。

⑪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 光档 10-1-91。

⑫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 光档 10-1-92。

⑬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三步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6日) 光档 10-1-91。

⑭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 光档 10-1-91。

运动过后松;宗族观念严重,敌我不分;坚持小自由,生产不积极^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光山事件”和“民主革命补课”的记忆对社教运动有重要影响。群众在工作队到来时产生的怕吃食堂、怕不让搞单干副业等顾虑与“光山事件”有关,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是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因^②,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③。党员和干部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怕挨整、怕处分、怕法办等的心态与“民主革命补课”中对干部的集训是有关系的。如夏店生产队的党员吕继德在“光山事件”中犯过错误,对社教运动态度消极。他说“积极么事,不积极有饭吃,有钱花;积极没钱用没饭吃,能把人憋的冒尿。”^④另外,在扎正“根子”与训练巩固“根子”过程中,一些“根子”由于受“光山事件”及“民主革命补课”的影响,怕得罪人,怕运动结束后被干部打击报复。如白果树生产队的女“根子”李映胜说“现在工作组在这里我们搞怪起劲,工作组走了,我们今后不又直不起腰来,跟民主革命补课样,开始我们搞怪好,最后一些集训干部回来了,光排斥打击讽刺我们,为一个小事破骂得我连门就不敢出来。”^⑤

三、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方式

按美国学者K·道易治的定义,社会动员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⑥。据此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是“现代化与政治关联最密切”的方面之一。他指出“这意味着人们将从与传统世界相联系的看法、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转向现代社会所共同的那套观念。这是文化、教育、交通的发达、大众传播媒介的敞开,以及城市化的结果。”^⑦

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阈中,社会动员通常是指“国家与政府通过特定的方式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的过程”^⑧。由于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特殊性,通常表现为“党通过政权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领导方式”^⑨。据刘明对中共社会动员历史演进脉络的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动员模式经历了4个阶段,分别是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以改善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以政治民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和以危机治理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⑩。其中,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⑪。

根据薄一波的看法,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

①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发动落后层的作法》(1964年1月21日),光档10-1-94。

②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6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页。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发动落后层的作法》(1964年1月21日),光档10-1-94。

⑤ 吕围孜工作队《白果树生产队扎正根子、培养根子的经过》(1964年1月27日),光档10-1-94。

⑥ [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⑦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⑧ 高冬梅《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

⑨ 梁颖《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的思考》,《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⑩ 刘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动员的历史演进与效应分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⑪ 叶青《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与社会动员的反思——以福建群众组织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搞得更好”^①。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修正主义”就是修正“农业集体化的路线”^②，“走资本主义道路”^③。农村的“和平演变”主要表现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④,一些干部“同阶级敌人有牵连”^⑤，“相互勾结”^⑥，“被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拉下水”,甚至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⑦,并篡夺了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⑧。由此可知,农村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属于社会动员的第一个阶段,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试图通过动员“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⑨。

具体到吕围孜大队,在工作队看来,主要存在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阶级斗争“很激烈”、“很尖锐”,“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破坏生产,打骂干部,带头搞单干副业”^⑩。同时,阶级敌人“暗地大量采用和平演变的手法,用请客送礼、金钱收买、宗族统治、结亲拜友”、“挑拨离间”、篡夺领导权、“记变天账”等手段,“来腐蚀和瓦解阶级队伍”^⑪;第二,两条道路斗争“十分尖锐”,尤其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的破坏是非常严重”,“对集体经济的巩固影响很大”^⑫;第三,“贫、下中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受打击、受排斥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⑬。加之,前文已述,各阶层普遍对运动有思想顾虑,落后层较多。因此,工作队对吕围孜大队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在讨论社会动员方式前,需对社会动员的主体与客体予以说明。社会动员的主体首先是县委派驻的社教工作队员。其次,工作队在开展社教运动的过程中,为了推动运动的开展,选拔与培训了一批骨干和“根子”,并由其对其他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动员。因此,骨干和“根子”也是社会动员的主体。骨干和“根子”大都为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如在63名“根子”中,有党员19人、团员3人、大队干部8人、生产队干部44人^⑭。全体干部和群众都是社会动员的客体。也就是说,骨干和“根子”既是社会动员的主体,也是社会动员的客体,具有两重性。

正如刘颖认为的那样,“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动员,只是内容和方式不同而已”^⑮。同样,任何政治运动也都离不开社会动员,社教运动亦不例外。为了消除各阶层的思想顾虑,解决存在的问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0页。

②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9页。

③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第314页。

④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第315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⑥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第405~406页。

⑧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第315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第385页。

⑩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⑪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⑫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⑬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⑭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⑮ 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兰州学刊》2006年第4期。

题,推动运动的开展,达到运动的目的,在吕围孜大队此次社教运动中,主要采用了下述几种社会动员方式:

(一)召开各种会议。会议动员是口头动员的一种形式,被广泛地运用。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工作中,就曾广泛地采用了这种社会动员方式^①。通过召开会议,说明运动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步骤等,并对运动进行部署,也是社教运动中最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在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会同大队党支部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召开了大量的各类会议,对与会人员进行动员。

工作队入队后,立即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说明来意,并与其共同研究制定了运动方案^②。随后,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分成两套人马,少部分负责组织与训练骨干,大部分负责领导与动员群众学习“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通过召开5个会,对不同人员进行了“双十条”宣传。第一个是党员、团员会,到会党员35人、团员51人。会议对运动的意义、方针、内容和基本步骤等作了说明,号召党员、团员带头学好“双十条”,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第二个是由112名大、小队干部、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扩干会,用5天时间,原原本本地宣读了“双十条”。学习时,采取了“读一段,讲解一段,讨论一段,边学习文件,边联系实际,边提高认识”的方法^③。其实,此次扩干会也是对骨干的训练会。除学习“双十条”外,还组织与会人员揭3个“盖子”,放自身的“包袱”,尤其是政治“包袱”,研究如何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④。第三个是以片为单位的3次社员群众大会,各片均结合实际情况,系统地宣读了“双十条”,重点讲解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和干部参加劳动等内容。第四个是以大队为单位的“四类分子”会,除宣读“双十条”外,重点学习了对待“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政策,并要求其不准乱说乱动,有事报告,外出请假。第五个是以大队为单位召开的“四类分子”子女会。除学习“双十条”外,重点学习了对待“四类分子”的政策。此外,对学习“双十条”比较差的老年人和妇女,通过召开老年会和妇女会等,进行了补课^⑤。

在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过程中,定“根子”后,工作队不断召开座谈会,组织“根子”学习“双十条”等文件,以提高其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⑥。另外,以大队为单位,用两个上午对“根子”进行了训练,查正了全大队的阶级成分^⑦。查正阶级成分后,工作队召开了“根子”会议,学习文件,研究串联发动的方法和贫、下中农加入贫、下中农组织的条件、方法、步骤、手续等,并成立了大队贫、下中农筹备委员会。随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了贫、下中农社员大会,大讲组织贫、下中农会的意义及贫、下中农会的性质、权利和义务等,动员其加入贫、下中农会^⑧。此外,“根子”在串联发动贫、下中农入会时,经常通过召开家庭会、联家会等,动员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加入贫、下中农会^⑨。

开展对敌斗争前,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对除斗争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了动员。召开骨干会、贫、下中农会员会、苦主会等,对斗争对象的材料进行了核实。同时,召开地主、富农子女会,动员其“在思想上同父母分开家”,揭发“父母的罪恶”^⑩。另外,还召开了妇女会和青年会等,对妇女和青

① 高冬梅《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

②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③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⑥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⑦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⑧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⑨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⑩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年专门进行了发动。斗争结束后,又召开了骨干会、贫、下中农会员会、“四类分子”子女会和群众会、老年会,动员其积极配合开展对“四类分子”的评查工作^①。

“四清”阶段,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动员。1963年1月28至30日,召开了训练干部会议。参会的共有105人,包括大队干部15人(8人为落选干部)、生产队干部90人。除组织与会人员大会学习与分片讨论“双十条”和县委有关文件中关于“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和团结95%以上干部等内容外,还组织干部总结了“四清”的好处:能挽救干部;能解决干群矛盾;能搞好集体经济;能正确贯彻多劳多得政策^②。同时,组织干部分析了“四不清”的危害与干部由好变坏的步骤。干部由好变坏通常分5步,依次是不参加劳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和敌人勾结,搞投机倒把,搞单干副业,抵触党的各项政策”^③。会议期间,针对干部的顾虑,工作队分头穿插召开了大队党支部、支部会、干部会等,层层进行动员。对问题较大的,由支委分工进行了谈话^④。为解除群众对“四清”的顾虑,发动其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分片召开了群众会,分队召开了贫、下中农会员会,还召开了小型群众座谈会,学习“双十条”,全面讲解了“四清”的内容、方针、政策等。另外,将由各生产队贫、下中农中选拔出来的73名清账人员集中起来,进行了为期4天的学习,并成立了大队清账领导小组和21个清账小组。大队清账领导小组分别由工作队副队长和大队会计担任正、副队长^⑤。此外,在处理“四不清”问题前,分别召开了干部会、干部家属会和群众会,动员干部“认真检讨,积极退赔”,动员干部家属“帮助干部交待问题,搞好退赔”,动员群众消除同干部的隔阂^⑥。

在解决公私关系问题时,针对人们的顾虑,首先召开了支部会、支委会、贫、下中农筹委会和生产队长以上的扩干会,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并训练与武装了骨干。在这4个会上,原原本本地学习了“六十条”和“双十条”中团结95%以上农民群众政策。学习过程中,总结了“集体化的成绩,查单干的危害,边学习文件,边联系实际,边讨论,边揭发各队违犯六十条的主要问题”。另外,分片召开了群众大会,结合“六十条”和“双十条”的相关内容,进一步说明了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目的和要求,并说明了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重要性^⑦。

在运动的第四阶段,进行思想建设时,召开了扩干会,开展了“怎样当好一个人民勤务员”教育,并总结出了当好干部的条件: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如实反映情况;办事公道;带头执行生产队的制度,带头维护集体利益,带头参加集体生产;提高警惕,加强对敌人的专政^⑧。

(二)开展诉苦活动。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在于“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⑨。中共在各项工作与政治运动中,广泛地采用了诉苦的社会动员方式^⑩。如

① 吕围孜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对四类分子评查工作的总结》(1964年1月25日),光档10-1-92。

②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二阶段训练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4年1月31日),光档10-1-91。

③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二阶段训练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4年1月31日),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光档10-1-92。

⑥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⑦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三步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6日),光档10-1-91。

⑧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⑨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⑩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高冬梅《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张永《解放战争中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等等。

侯松涛的研究表明,“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①。

同样,在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中,也运用了诉苦的方式,动员干部和群众参加运动。在运动第一阶段的扩干会上,工作队组织了15人诉苦,“不仅诉过去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苦,也诉了受资本主义的苦,不仅诉了受阶级敌人的苦,也诉了自己上当受骗的苦”^②。在扎根串联,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过程中,普遍进行了诉苦。如工作队员陈苏训在鄢店生产队培养“根子”时,用“引苦诉苦”的方式动员“根子”,使其被“从梦中唤醒了”,“将新旧仇恨变为力量”^③。夏店生产队社员吕大新的妻子刘玉华是“落后层”,曾阻挠吕大新参加会议。“根子”吕纪德采用诉苦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发动。“男的谈了他过去受高利贷的剥削,当田当地的苦,女的诉了她当童养媳嫁卖四道的苦。俩人诉到苦处声泪俱下”,并共同表示“互相帮助,坚决同贫、下中农一道前进,争取都入会”^④。对敌斗争结束后,工作队和党支部要求各生产队开展“六查六诉”。“六查六诉”的内容是:诉封建敌人剥削苦与查上敌人当相结合;诉宗族统治苦与查续家谱、宗族矛盾影响干群团结相结合;诉封建婚姻制度苦与查包办婚姻相结合;诉资本主义剥削苦与查投机倒把和单干副业影响集体相结合;诉敌人、土匪苦与查偷盗、赌博、牛鬼蛇神相结合;诉伪保甲制度、苛捐杂税苦与查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相结合^⑤。此外,有些生产队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查诉。如涂小湾生产队开展了下述查诉:诉旧社会封建迷信的苦,查现在上了哪些当;诉旧社会抓丁、抓夫、抓差的苦,查现在幸福的来源,对比新制度的优越性^⑥。

在运动的第三阶段,亦开展了诉苦教育。在诉苦中,主要算了集体损失账、个人收入减少账和国家支援账。在算账的基础上,有的生产队还诉了单干的苦,对比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通过诉苦与对比,总结出了单干的“十大害处”:不能解决耕牛和农具困难;不能抗拒自然灾害;不能充分发挥劳动潜力;不能解决水利纠纷;不能大力支援国家建设;不能有效地改良土壤;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巩固集体经济;不能提取公共积累扩大再生产^⑦。

(三)进行“四史”教育。通过“四史”对干部和群众尤其是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是东北等地创造出来的典型经验^⑧,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认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⑨此后,这一经验在全国各地被普遍推广开来。如北京市郊区农村结合社教运动,从1963年6月开始,发动群众写出了大量的家史、村史、社史以及各种专题史^⑩。光山县对“四史”教育也相当重视,县里和各公社专门成立了“四史”展览馆,进行巡回展览,并组织人员编写了一些村史、家史、地霸罪恶史等^⑪。

驻吕围孜大队社教工作队特别重视“四史”教育,用以调动干部和群众尤其是青年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在运动第一阶段的“四类分子”子女会上,邀请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李朝德,对与会人员

① 侯松涛《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

②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③ 陈苏训《在鄢店生产队扎根和培养根子的作法》(1964年1月26日),光档10-1-94。

④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没有对敌斗争任务,查影响进行阶级教育的作法》(1964年1月30日),光档10-1-92。

⑥ 《吕围孜大队涂小湾小队查影响简况》(时间不详),光档10-1-94。

⑦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三步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6日),光档10-1-91。

⑧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⑨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1963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7页。

⑩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本市郊区农村结合四清运动编写家史、村史、社史的情况》(1964年8月),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57页。

⑪ 中共光山县委宣传部《“五史”编写工作的内容和要求》(1964年3月24日),光档1-1-555。原档案无标题,标题为档案整理者所加。

进行家史教育。李朝德“揭露了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指出了“四类分子”子女的前途,对其进行了阶级教育。在扩干会上,通过“四史”教育,调动与会人员的阶级感情,动员其“洗手洗澡”,主动放“包袱”。在组织阶级队伍时,广泛运用了“四史”教育的方式,发动贫、下中农参加贫、下中农会。通常以生产队为单位,培养“苦大仇深”的典型,大讲本村的阶级斗争史,“既讲过去的,又讲现在的,通过活的材料,发动贫、下中农总结阶级斗争史”,以激发阶级感情^①。有的还通过觉悟高的家庭成员发动落后成员,发动的方式是由觉悟高的成员讲家史与传家史。如吕围孜生产队的吴乃和家有4口人,两个儿子的思想“比较进步”,父亲思想“一般”,母亲“思想比较落后”。两个儿子用了两个夜晚谈“苦去甜来”的家史,感动了父母,全家第一批加入了贫、下中农会^②。

(四) 进行典型示范。典型示范是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中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为了动员干部和群众参加运动,不少工作队员成为了开展运动的模范典型。涂小湾生产队地处城乡结合部,“社员都是弃农经商”的,“挑挑贩贩,各自单干”,加上生产队的“几个干部,特别是生产队长李朝寿贪污拉用公款”,“群众干活分不到东西”,以致“无人生产,64亩麦子无人锄,水利、积肥无人管,副业是单干,干群情分分散”。工作队员管绪光进驻该队后,“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积极工作”,在短时间内“扭转了落后局面”。管绪光的模范带头作用主要表现在:带头学习与宣传“双十条”等文件;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关心贫、下中农生活,及时解决贫、下中农困难户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③。

同时,工作队及时发现并利用运动中出现的典型,对其他人进行动员。如在1963年1月28日至30日的训练干部会上,工作队组织了典型,让其带头放“包袱”,揭自己“四不清”的“盖子”,带动其他人放“包袱”^④。在运动的第三阶段,为了树立旗帜,表扬先进,调动干部和群众解决公私关系问题的积极性,开展了评功摆好活动。摆好的具体内容包括“你在劳动中表现怎样”、“你对集体财产爱护怎样”、“你对服从领导,遵守劳动纪律怎样”、“你对团结互助搞的怎样”、“你对坏人坏事是否敢揭发和开展斗争”、“你对维护集体利益和巩固集体经济做的怎样”。全大队应参加评功摆好的有1193人,实际参加了826人,共摆出好人好事2896条,评出“五好干部”35名、“五好社员”81名、“五好饲养员”16名、“五好生产队”4个。典型树立后,全大队以其为学习对象,开展了“六比”竞赛,“比走集体化道路好,比劳动生产好,比干活质量好,比团结互助好,比完成任务好,比服从领导遵守劳动纪律好”^⑤。

(五) 知心人发动知心人。利用亲戚、朋友等亲密关系,进行亲串亲,邻串邻,知心人发动知心人,是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中社会动员机制的特色。在宣传“双十条”时,对未参加会议学习的产妇和病人,工作队组织了与其关系“亲近”的骨干,以“登门看病或看小孩”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双十条”宣传^⑥。在串联发动贫、下中农加入贫、下中农组织时,也比较广泛地采用了这种社会动员方式。概括起来,知心人发动知心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有的运用忆苦思甜,有的用现在(的)甜,引起过去的苦”。黄大店生产队的“根子”王怀田在串联发动吕大福时,就采用了第一种方法。王怀田从谈家常入手,运用忆苦思甜的方法,通过一次谈话,就把吕大福发动了起来^⑦。

(六) 进行物质刺激。物质刺激是最直接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正如刘颖所指出的那样:“满足人民的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是社会动员的基础,社会动员要以被动员者的实际物质利益为实现条

①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②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③ 吕围孜工作队《关于管旭光同志模范事迹》(1964年1月21日),光档10-1-94。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二阶段训练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4年1月31日),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三步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6日),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⑥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⑦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件,一切脱离被动员者实际利益的社会动员都不可能持久,因而利益调整在社会动员中起着关键作用。”^①工作队为了发动贫、下中农参加社教运动,在运动开始后不久,通过扩干会放“包袱”,大体上摸清了全大队贫、下中农困难户的基本情况^②。全大队“真正缺吃、缺住、缺穿”的贫、下中农困难户共有138户^③。至运动结束时,已解决119户,共解决粮食6650斤、现款830元、布票1272尺、皮棉18斤、农(家)具83件、工分16000分,盖房屋6间,修理房屋66间,安排32人搞副业,帮助16人治病^④。此外,“四清”成果除1963年以前的全部归集体,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当年的农副业收入“按比例扣除”后,全部分配给社员。清理出来的粮食和布票特别照顾了贫、下中农困难户^⑤。

(七)发挥骨干的作用。工作队在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动员时,充分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如在宣传“双十条”时,全大队共训练了73名知识青年,作为宣传员,按“双十条”要求,配合工作队,利用“饭前饭后,赶集走路,晚夜聊天,田间劳动,大会小会,个别交谈等方法”,广泛地对“双十条”进行了宣传^⑥。在动员干部放“四不清”“包袱”与动员群众揭干部“四不清”“盖子”时,充分发挥了“根子”的作用。“根子”通过走家入户的方式,对“四不清”的落后层(干部家属、老年人、落选干部)进行了发动^⑦。

(八)实行“四同”。“四同”是指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后十条”规定“工作队的成员,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⑧驻吕围孜大队社教工作队的大部分队员从入队开始,就积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如驻李店生产队的队员张学元入队后,住在了贫农李建花家里^⑨。队员叶继顺除了工作外,大多数时间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共拾粪140余斤^⑩。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四同”,赢得了群众的欢迎,与群众“建立了感情”、“有了共同语言”,激发了其参加运动的积极性。李建花表示“这一下子有人撑我腰杆子,一定拼命干”^⑪。在选定“根子”过程中,工作队员通过“四同”的方法,访问“现有的好干部”、土改时期的老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对党支部提交的“根子”名单反复进行了审查^⑫。

除上述方式外,在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中,工作队还采用了其他方式,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动员。如为了造成“到处宣传”“双十条”的声势,工作队组织了吕围孜完小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组成宣传队“到村到生产队工地进行宣传”^⑬。对因走亲戚或外出搞副业而未学习“双十条”的人员,工作队均确定了专人,等其回来后,进行了补课^⑭。在运动的第三阶段,为了动员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在制定生产规划前,工作队和党支部总结了王湾生产队改变生产面貌的经验,并组织各生产队学习。同时,组织干部和老农参观了方寨大队的后寨生产队,学习该队平均亩产680斤的经验^⑮。

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在开展某项具体工作时,工作队通常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对干部和群众

① 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兰州学刊》2006年第4期。

②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③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④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⑥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⑦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光档10-1-92。

⑧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第388页。

⑨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⑩ 吕围孜工作队《吕围孜工作队讨论简报》(1964年2月9日),光档10-1-92。

⑪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第一步工作总结报告》(1964年1月4日),光档10-1-91。

⑫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⑬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⑭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⑮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进行动员。如前文已述,在对“双十条”进行宣传时,就同时采用了召开会议、知心人发动知心人、发挥骨干的作用等多种社会动员方式。其次,各社会动员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交织在一起。如在进行诉苦时,通常有谈家史、村史、地富剥削史等“四史”教育方面的内容。

四、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社会动员的成效

如前文已述,县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坚决搞好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队,达到高标准。”^①1964年4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静文对“高标准”作了具体说明“其一,认真地宣传讲解了中央两个文件,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其二,经过扎根串联和细致地组织工作,组成了一支坚强的革命阶级队伍;其三,深入发动群众,在组成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正确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对敌专政制度;其四,作好四清,真正按照政策,解决了四不清的问题,干部、群众都很满意,解决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改进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其五,按照‘六十条’,正确地处理了公私关系,也就是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六,把以党支部为中心的基层组织整顿好了,要使党支部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通过社教运动,要真正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坚定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各种‘牛鬼蛇神’都压下去了,集体经济巩固了,生产高潮出现了。另外,社教运动以后,要保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出现阶级队伍涣散、干部脱离群众、集体经济不巩固的现象。”^②

张丽梅的研究表明,“采取正确的动员方法”是“社会动员的关键所在”,“能使社会动员取得预期效果”^③。在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中,由于采用了较正确的社会动员方式,运动基本上达到了县委提出的“高标准”要求。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基本上消除了人们对社教运动的顾虑,使运动得以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了明显的战绩,尤其是“双十条”贯彻得“比较好”,阶级队伍组织得“比较广泛”,对敌斗争开展得“较好”,运动与生产结合得也很好^④。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 解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提高了参加运动的积极性。

通过前文所述的社会动员方式,吕围孜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基本了解了运动的目的、方针、政策等,基本消除了对运动的顾虑,参加运动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经过宣传与动员,“双十条”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等于出了“安民布告”,消除了人们对运动的各种猜测与顾虑。据统计,全大队95%的人听过“双十条”宣传,多的达到10余次,少的也在3次以上^⑤。党员、团员和干部听过宣传后,“怕‘挨整’的顾虑消除了,头脑清醒了,革命意志增强了”,“‘想换班不愿干’的干部表示坚决干到底”。如有“长工短工,十月一日满工”思想的翁店生产队长翁光亮表示“党不叫不干,群众不叫不干,死了不干,除了这三不干,坚决干到底。”贫、下中农听过宣传后,“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担心运动“不解决问题,搞不彻底”的人“劲头也大了,信心更足了”。“上当的人也觉醒过来”,认为“双十条”如“照妖镜”,“一照妖魔鬼怪都露出了原形”,再“不会糊涂上当了”。中农听了宣传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再担心被“划成富农,整到自己头上”,“情绪更加稳定”,开始向贫、下中农靠拢。“四类分子”听了宣传后,“精神也有了变化”,认识到“不

① 《孙化三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稿)》(1963年11月24日),光档1-1-486。

② 《关于第一批二十二个大队系统社教的高标准问题——张静文同志在公社书记、二十二个大队系统社教试点工作队长会议的讲话(记录稿)》(1964年4月14日),光档1-1-527。

③ 张丽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社会动员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④ 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印《光山县二十二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大队运动概况汇编》(1964年5月30日),光档1-1-530。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给自己的子女戴坏分子帽子”。地、富子女听了宣传后,感觉有了希望与前途,纷纷表示和“家庭决裂,好好参加劳动,听贫、下中农的话,跟贫、下中农一块走,教育自己的父母老实守法,立功赎罪”。同时,搞单干副业的“主动向集体交款”,受敌人拉拢的决心与之“彻底决裂”,排斥贫、下中农的“积极检讨,表示坚决跟贫、下中农一块走”^①。

在开展“四清”工作时,通过动员,干部提高了对“四清”的认识,纷纷自我检讨,主动放“包袱”。如翁光亮检讨说“我用了队内8元钱,贪污150分,这比过去国民党保甲长还毒十分,过去他们要钱还取个名字,我这连名字就没有,随用随合手。”^②经过动员,群众的顾虑“慢慢就小了”,由不敢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到“偷偷”地揭发,再到“找着”揭发。清账人员经过动员后,也消除了思想顾虑,积极开展查账工作^③。

在运动的第三阶段,经过动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如翁光亮在对照“六十条”检查该队违反“六十条”的情况后说“处理公私关系真重要,公私界限搞好了,集体经济才能巩固”。吕围孜生产队社员吴乃和也说“六十条上说的就是有道理,集体生产搞不好,就是自留地、开荒地长金豆子也是不行的。”^④

此外,针对“光山事件”和“民主革命补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工作队教育干部和群众“光山事件”是阶级敌人搞的,是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搞的”,“不是我们干部搞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种宣传带有片面性,没有揭示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人们的担忧。如白果树生产队“根子”李映胜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光山事件’上的问题,一不怪党,二不怪干部,三不怪群众,只怪光山大坏蛋马龙山的老婆腐化了马龙山,使马龙山蜕化变质了,县委书记处书记打死了,何况下面干部和群众呢?”^⑤

(二) 摸清了阶级分布情况,组成了阶级队伍,开展了对敌斗争。

扎根串联开始后,党支部向工作队初步推荐了49名“根子”^⑥。经工作队与大队支委反复审查与动员,淘汰掉了其中的4人,又新选了18名“根子”,共扎正“根子”63人^⑦。其中,贫农55人,下中农8人^⑧。对全大队的阶级成分进行了查证,厘清了土改以来阶级成分的变动情况,搞清楚了阶级分布状况:贫农332户1410人,下中农78户293人,中农52户205人,上中农27户182人,小土地出租22户82人,富农16户66人,地主12户56人。查证阶级成分,为加强对敌专政与组织阶级队伍,奠定了基础。到运动结束时,共分3批,发展了953人加入贫、下中农组织,占应入会人数的96.4%,组成了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经过对“四类分子”的评审,全大队有“四类分子”27人。其中,守法的为8人,基本守法的为7人,有一般破坏活动的为9人,有严重破坏活动的为3人^⑨。经县公安局批准,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3人,在生产队,进行了小会说理斗争^⑩。

(三) 基本解决了干群关系和公私关系问题。

通过发动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动员群众揭干部“四不清”的“盖子”,组织技术力量查账,

①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②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光档10-1-92。

③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④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工作队《白果树生产队扎正根子、培养根子的经过》(1964年1月27日),光档10-1-94。

⑥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⑦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⑧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⑨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⑩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查清了全大队干部“四不清”的情况:在138名新老大、小队干部中,“四清”的有52人,有一般“四不清”问题的为80人,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为6人;共清理出贪污、挪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现款3350.73元、粮食415斤、布票102尺、工分180分、家具及其他物资128件。根据政策,应退赔现款3347.95元、粮食415斤、布票102尺、工分180分和实物128件。至5月23日,已兑现现款879.5元、布票34.7尺,分别占应兑现总数的26.2%和34%,粮食、实物和工分全部兑现^①。

在公私关系方面,通过评功摆好,将违反“六十条”的情况揭发了出来:全大队有搞单干副业的架子车93辆;75人搞鸭毛换烟火、粮食换纸烟以及卖小百货等;多分自留地7.2亩,不合理开荒31.16亩;丢失农具291件。此外,还有干活不讲质量,巧混工分等。以“六十条”为准则,将7.2亩多分的自留地和31.16亩不合理开荒,全部收归集体,对丢失的农具适当作价赔偿,将93辆单干架子车全部纳入集体^②。

(四) 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

经过对干部和群众的动员,在积极性提高的基础上,依据“双十条”、“六十条”以及县委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具体制度。如对敌斗争后,各生产队均建立了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小组和督导小组,“树立长期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做到“敌人一有破坏,就要向他开展斗争,大破坏大斗争、小破坏小斗争,谁破坏斗争谁,啥时破坏啥时处理”^③。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了以下制度:第一,现金管理制度。生产队专款专用,库存现金不得超过20元。收入实行“三对照”(会计、保管和交款人),开支单据加经手人的章,做到钱账分管和管用分开。生产队每月向大队报账一次,月月清查核对;第二,开支审批制度。对生产队“正当性”的生产性开支,少量的实报实销,现金20元、粮食40斤由贫、下中农代表小组批准,并由社员大会通过。对“正当性”的非生产性开支,根据数目多少做如下处理:现款3元、粮食5斤的由生产队长批准;现金4至10元、粮食6至10斤的,由贫、下中农代表小组讨论与队委会批准;现金10至20元、粮食11至40斤的由贫、下中农讨论与社员大会通过,并报大队管委会审查批准;第三,实物管理制度。实物管理做到“入有秤,收有账,出有证(三联单),分有本(社员分户分粮本)”和“有专室”(即保管室,专人管理,实行多把锁制度)。同时,固定资产和中小型农具做到“固定资产登记簿,农家具登记本,增添及时入账,递减适时取消(消)”;第四,工分管理制度。生产队有工分账,记工员有考勤簿,社员有工分本。党、团员生活会、社员会、私人赶集、干私活一律不给工分;第五,民主理财制度。生产队财务半月口头公布一次,每月张榜公布一次。生产队的财务计划和分配方案、各种照顾等,召开贫、下中农小组会讨论,由社员大会通过;第六,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生产队干部做到“劳动好,工作好”,实际参加的劳动日高于一般劳动力的30%^④。在运动的第四阶段,进一步完善了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规定大队党支部书记、管委会主任、政治指导员和会计每月保证做到10个劳动日,其他干部保证做到14个劳动日。此外,第四阶段还建立健全了党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制度。党支部生活每月1次,小组生活半月1次;支部学习1月3次,小组学习1月4次。工作实行分片负责,统一领导,做好重点,定期碰头^⑤。

(五) 加强了生产建设与组织建设。

吕围孜大队的生产建设贯穿于社教运动的始终。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通过宣传“双十条”,解决了“某些干部和社员”“认为冬天没啥可搞的冬闲思想”,掀起了冬季生产热潮。至1964年1月26

①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②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③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吕围孜大队四清工作的作法》(1964年3月19日),光档10-1-92。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日,全大队积肥 133280 担,1369 亩冬播作物普遍锄了 1 遍草,锄 2 遍的有 320 亩,施肥 1061 亩,启动水利工程 36 处(完工 33 处),植树造林 6 亩,零星植树 13990 棵,等等^①。在运动的第三阶段,通过查单干危害,开展对比集体化道路优越性教育,组织干部参观生产先进单位,广大社员“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展集体生产”。各生产队都制定了 1964 年的生产规划。全大队规划的结果是,相比 1963 年,粮食总产量增长 20%,油料增长 40%,棉花增长 20%,林业增长 2 倍,多种经营收入增长 1 倍。为实现规划,党支部提出了“学大寨,赶大寨”口号,采取了大抓肥料、技术革新和水利基本建设等,掀起了比学赶帮的春耕生产高潮^②。

在组织建设方面,重点抓了党、团组织建设。运动中,工作队“坚持依靠党支部”,充分发挥了党员和团员的作用,使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其“思想觉悟”。从对 37 名党员的排队情况看,“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工作积极”的由运动前的 9 人增加到 29 人,一般的由 17 人减至 7 人,“消极落后”的由 11 人减至 1 人^③。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吸收了 2 名积极分子为预备党员和 22 名积极分子为团员,动员 25 名超龄团员退团。同时,改选了党支部委员,原有 9 人,落选 1 人,连任 8 人,新选 1 人,仍为 9 人。另外,将 37 名党员重新编为 5 个党小组,重新选举了党小组组长。在调整干部班子方面,大队管委原有 17 人,落选 6 人,新选 6 人,仍为 17 人;生产队干部有 119 人,落选了 14 人,生产队各增加了 1 名政治宣传员,等等。此外,正式成立了贫、下中农会,成立了 21 个贫、下中农代表小组和由 9 名委员组成的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④。

但是,按县委的“高标准”要求,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仍存在一些问題。具体来说,主要有 5 个方面:第一,“四不清”退赔兑现情况不甚理想;第二,少数生产队的赌博现象有所抬头。如李店东生产队春节后,赌博始终未间断,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社员、“四类分子”子弟等在一起赌博;第三,公私关系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仍有 39 人搞单干副业;第四,个别生产队的班子不够健全。如李店西生产队有 7 名队委委员,除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组长外,其余 6 人对“队里的生产和工作都不管不问”;第五,个别干部又出现了新的“四不清”问题^⑤。

五、关于社教运动社会动员若干问题的讨论

最后,关于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笔者拟对下述 3 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 社会动员是国家意志向基层渗透的路径。

前文已述,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双十条”是由中共高层起草制定,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最高层修改与认可,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的。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社教运动的第三个纲领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⑥。另外,“六十条”是社教运动中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和准则。“六十条”的起草与修定是由毛泽东

①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 10-1-91。

②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 年 5 月 23 日),光档 10-1-91。

③ 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工作队《城郊公社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总结》(1964 年 5 月 22 日),光档 10-1-91。

④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 年 5 月 23 日),光档 10-1-91。

⑤ 中共光山县委办公室编印《光山县二十二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大队运动概况汇编》(1964 年 5 月 30 日),光档 1-1-530。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9~470 页。

亲自主持的^①,于1962年9月2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②,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可以说,“双十条”、“二十三条”和“六十条”是中共高层意志的体现。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对国家实行领导。因此,“双十条”、“二十三条”和“六十条”也代表了国家的意志,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社教运动以“双十条”、“二十三条”和“六十条”等文件为指针,按照其规定开展。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动员干部和群众贯彻落实“双十条”、“二十三条”和“六十条”等文件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动员的过程,是落实国家意志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社教运动的社会动员是国家意志向基层渗透的重要路径。这一点在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的社会动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当时吕围孜大队的干部和群众眼中,毛泽东是国家的代表,是“党与政府的人格化象征”^③。经过动员,干部和群众纷纷称颂毛泽东的伟大,称颂中央政策的正确性,使国家意志迅速地渗透到吕围孜大队。如经过“双十条”宣传,吕围孜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一致赞扬说,毛主席真英明,农村一切事情看的(得)清,中央文件好比明灯一盏照亮了全国,毛主席真英明,办事处处为穷人”。贫下中农代表胡少海说“中央文件好比黑夜之间点汽灯,照亮了前途方向,毛主席真英明,农村事情看得清。”^④通过解决贫、下中农困难户的困难,贫农们说“过去是空依靠,这次是实依靠,再不积极劳动,咋对得起党和毛主席。”^⑤白果树生产队的社员经过“四史”教育与控诉“旧社会”,激发了“阶级感情”,“异口同声的(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毛主席救出来的,毛主席说的话,句句是为咱们穷人,组织贫、下中农会是要彻底革命,彻底翻身,我们坚决团结起来,老账新账一齐要,旧恨新仇一齐报,不斗倒敌人,誓死也不罢休’”^⑥。通过“六查六诉”,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和阶级教育”,纷纷表示“今后我们团结起来,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向牛鬼蛇神、歪风邪气开展斗争,维护集体利益,搞好集体生产,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⑦

(二) 社会动员中坚持政治正确标准。

何一民的研究表明,社会动员在多数情况下,以“政治动员”的面目出现^⑧。社教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众多政治运动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一个,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一种政治动员。政治动员通常强调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和原则,也是政治动员得以开展的重要保证。

在吕围孜大队社教运动的社会动员中,很重视政治正确。如在宣传“双十条”时,选择宣传员首重政治正确,其标准是“思想好,立场坚定,热爱集体,具有高小文化程度”^⑨。选择与扎正“根子”时,政治正确也是首先考虑的问题。“根子”的标准是“历史清楚,苦大仇深,热爱集体,联系群众,立场坚定,劳动好的贫、下中农”^⑩。不符合政治正确标准的人被排除在“根子”外。如在工作队审查淘汰掉的4名“根子”中,1人不起作用,1人被敌人拉拢,2人搞单干副业^⑪。

在串联发动贫、下中农,成立贫、下中农组织,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时,政治正确也得到了充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0~945页。

②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③ 刘凌旗《非常规权力组织与角色交叉: 四清运动动员主体的权力困境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④ 吕围孜大队工作组《吕围孜大队训练骨干会议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8日),光档10-1-91。

⑤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⑥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⑦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⑧ 何一民《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⑨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⑩ 吕围孜工作队《白果树生产队扎正根子、培养根子的经过》(1964年1月27日),光档10-1-94。

⑪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分的体现。当时,全国统一的贫、下中农组织章程尚未公布。吕围孜大队在成立贫、下中农组织时,主要依据的是中共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制定的有关章程。省委和地委章程强调在选择贫、下中农组织基层组成人员时,要重视政治正确这一标准。省委《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组织的试行办法》规定: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的组成人员要由“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劳动积极,热爱集体”、“办事公道”,“能代表贫农、下中农利益和历史清楚的人担任”^①。地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贫农、下中农组织试行条例(草稿)》规定,贫、下中农代表的条件是“真正的贫农、下中农,历史清楚,劳动积极,思想进步,办事公道,联系群众,热爱集体,作风正派的人”^②。依据上述条件,吕围孜大队及所辖生产队均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如程岗生产队在建立贫、下中农筹备小组时,挑选组织成员的标准是“立场好,觉悟高,热爱集体,大公无私,苦大仇深,斗争坚决的贫、下中农”^③。同时,在吸收贫、下中农组织会员时,根据政治正确,进行了分批串联发动。第一批串联对象是“阶级立场好,集体劳动好,政治觉悟高的年满15周岁”的贫、下中农和符合上述条件的“非贫、下中农成分的共产党员”。第二批串联对象为“原来政治觉悟较低,或者有一般性错误,但现在觉悟提高,能够检讨改正的”贫、下中农和非贫、下中农成分党员。另外,167名贫、下中农因“错误比较严重,有的还没有真正检讨,有的虽然作了检讨,还需考验,确实改正了错误,放在运动后期,个别串联发动,吸收入会”^④。在未被吸收入会的36名贫、下中农及其他成分党员中,除6人因耳聋、眼瞎、身体残疾不能入会外,其他大都因“有重大历史问题,和四类分子通婚”等问题不能入会^⑤。

此外,进行组织建设时,同样强调了政治正确。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与入团,以及调整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时,坚持了“积极工作,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热爱集体,积极劳动”的原则与标准^⑥。

(三) 社会动员主体困境的再探讨。

刘凌旗认为,作为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和贫协终难遮掩其‘角色暂时性转换’的发展性质,并于政治动员的权力互动中显露出实际运作的困境”^⑦。对于刘凌旗的判断,本人深表赞同。但是,在讨论此问题时,还应考虑社教运动的阶段性和地方性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196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⑧。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相较“双十条”,强调“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⑨,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一边^⑩。在上述文件颁布前的社教运动阶段,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组织在社会动员的实际运作中,其困境没有文件颁布后的社教运动明显。以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为例,工作队在对于干部和

①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组织的试行办法》(1963年5月8日),光档1-2-568。

②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印发“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贫农、下中农组织试行条例”(草稿)的通知》(1963年5月15日),光档1-2-568。

③ 《如何发挥贫、下中农小组的作用》(时间不详),光档10-1-94。

④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

⑤ 《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情况的总结》(时间不详),光档10-1-91;《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资料统计表》(1964年5月14日),光档10-1-93。

⑥ 城郊公社吕围孜社教工作队《吕围孜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4年5月23日),光档10-1-91。

⑦ 刘凌旗《非常规权力组织与角色交叉:四清运动动员主体的权力困境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⑧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0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1页。

群众进行动员时,依据“双十条”规定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①和“不要让贫下中农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②,发挥了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的作用。如前文已述,在制定运动方案、选择“根子”等时,考虑了党支部的意见。同时,吕围孜大队的贫、下中农组织正式成立是在运动即将结束时,在第一阶段成立的只是筹备组织,贫、下中农组织在社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如程岗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会筹备小组成立时,其组织成员“对能否团结全体贫、下中农,同心同德搞好生产的信心不足,感到自己没能力搞不好”^③。可以说,驻吕围孜大队社教工作队和吕围孜大队的贫、下中农组织在社会动员的实际运作中,基本没有什么困境。

社教运动中,有些地方的工作队是由外县、外专区乃至外省的队员组成,在1964年下半年以后各省级或专区级重点县开展的大兵团作战中,尤为突出。由于工作队员来自外地,与本地没有太多的联系,在开展运动时,将本地干部和组织撇在一边。同时,工作队大力扶植了贫协。由此,导致了工作队和贫协在社会动员的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刘凌旗所说的困境。如中共淮阴地委组织了200余人的社教工作团,于1963年11月中旬至1964年3月在涟水县高沟公社开展了社教试点。试点中,工作队撇开当地的社、队干部,凌驾于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之上,并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及其工作进行监督,乃至限制干部的人身自由,开干部的批斗会、算账会,搞扩大化和逼供讯”。在运动后期,特别是工作队撤离后,基层干部对贫协组织和贫、下中农进行了“打击报复”与“反清算”^④。但是,并非所有开展运动的地区都是如此。如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在时间上大体与高沟公社相近,且吕围孜大队是县委确定的试点。不同的是,派驻吕围孜大队的工作队员均为本县机关、本公社机关的干部,且该大队在县城附近,可以判断吕围孜大队的干部与群众对工作队员并不感到陌生。所以,工作队员在开展运动时,还是有所顾虑的。同时,前文已述,干部和群众对此前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光山事件”和“民主革命补课”的记忆深刻。因此,这些地方性因素使得吕围孜大队的社教运动开展得相对比较和缓,即使是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仅限于进行小会说理斗争。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江苏 210046)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第391页。

②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第321页。

③ 《如何发挥贫、下中农小组的作用》(时间不详),光档10-1-94。

④ 王永华:《“四清”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7页。